

聊几句黄裳

□陈老萌

喜爱黄裳文章的人不少,他很会写文章。我也佩服黄裳,而且羡慕,他写得那么好。只要见到报刊上他的署名,大抵不会放过,当然寓目的仅是黄裳著述的什一。黄裳为文,说书、记事、忆人,有材料有识见有情思,每读多有受益。譬如他谈论“贰臣文学”,细察失节文人流露在诗文里的复杂心绪,颇见别裁意味。即使偶尔获益有限,便专注他文章的如何会做。挥洒自如,通晓明达,儒雅亲切。我曾对人感慨,时下如黄裳这么会写文章的作者不多了。这样的文章,单有学问的教授写不出来,没有学问的文人更写不出来。唐弢为黄著《旧戏新谈》作跋说过:“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。”五十来年后,黄裳引述此言自诩:“这是很高的赞誉,也确实看出了《(旧戏)新谈》的特色。”

一九九四年黄裳披露一组钱钟书给他的信《故人书简——钱钟书》,为第十五封信所作一段读解,足以见他行文老道。(文见中华书局版的黄著《书之归去来》)钱信仅百余字,先逐录以便说话:

北来得三晤,真大喜事也。弟诗情文思,皆如废井,归途忽获一联奉赠:

遍求善本痴婆子
难得佳人甜姐儿

幸赏其贴切浑成,而怒其唐突也。如有报道,于弟乞稍留余地。兄笔挟风霜,可爱亦复可畏(如开会多、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)。赵家璧君处乞为第一促,谢谢。即上裳兄文几。徐高二公均候。弟钱钟书再拜。内人同叩。三十日。

黄裳文字也不长,一并录下:

于书丛中又发现默存一笺,系一九五〇年春所作。是年我因事到北京,曾去清华园。在许多教授中,相熟的只有默存,曾数度访晤,听他畅谈,真是妙语如珠,可惜未作报道。所谓《痴婆子传》,是我在琉璃厂买得的一册抄本,是书肆伙友从旧本中影写的,实在算不得“善本”。但此联实在是妙手天成,不愧佳制。赵家璧处,是要我代催《围城》版税。徐高是徐铸成和高季琳,是一起同住的,“三十日”想系笔误,

此处不说其他,单下笔细密,就忍不住拍案叫绝。高季琳者即大家熟知的作家柯灵,避熟就生,是不愿提及这位与他反目的旧友。曾经患难与共的两人,现今柯灵落在黄裳眼里已嫌恶至极。然而钱钟书问候“徐高”,他不得不作一交代。换个名字,既不违背事实,又遂自己心愿,深谙春秋笔法也。于钱信相关背景的注释可谓详尽,可偏偏遗漏了今日读者不甚了然的“甜姐儿”。这个甜姐儿不是奥黛丽·赫本演的洋妞,实四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中国影片女主人公,黄宗英饰演。“甜姐儿”由此成名,俘获众多影迷,传言黄裳亦其中一位。并传言,原名容鼎昌的黄裳,笔名由此而来。纵然成不了恋人,但甘为佳人服饰。传言究竟如何,虚虚实实。不意知情人钱钟书凑趣,几近坐实。黄裳只得装聋作哑,我们于聋哑则会心一笑。例子无关宏旨,琐屑中却透露作者为文之用心。

近日捡起黄裳《来燕榭文存续集》万余字的“后记”再读一过,又连续读了多篇他与人争辩的文章,才晓得老先生四处开枪,对准了葛剑雄、张中行、韩石山、止庵,以及曾经的尊长柯灵。文章里是是非非,未敢置喙孰是孰非,我有兴趣的依旧是看他如何地做文章。这么密集地一看,不大赞赏他火药味太浓的文字。绝非反对他争辩,不赞赏他争辩时的姿态心态。简练不见了,睿智不见了,离开了早先的儒雅,少了些坦然诚恳。某些过结不妨也来点装聋作哑,若要申诉,平实澄清原委便作罢,非要表明态度,分寸内点到为止。何苦纠缠不脱,弄得像吵架。“后记”开首就说,拜读对手文章“不禁失笑。直感地想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‘嘘’过的‘粪帚文人’又借尸还魂了。”这样的文字似意气用事,节外生枝了。黄裳常置鲁迅杂文于案头,操鲁迅匕首论战。鲁迅是刺向腐朽的封建伦理和掌权的反动统治,黄裳交锋的毕竟不是敌人,充其量个人恩怨而已,大可施行“费厄泼赖”。争论由明辨是非下滑到恩怨互怼,当是学问的不幸。以黄裳在读书界的资格和声望,做做宰相何妨呢。读者除了看纠纷的是非,同样会看看谁文风的纯正。

我想,如果不写这批争论文章,或不写得这么大火气,“文体家”的黄裳,他的文体是不是要完美一些。惋惜了啊!

273

中国传统的文献校勘,有两大方法:一是“本校”,即“死校”,以古书的不同版本对勘,以定其本字;一是“理校”,在没有善本可供对照的情形下,借助旁证以推测其本字。清代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就是“理校”的巅峰。但胡适以为,二王虽高不可攀,终非校勘学的正道,而“理校”再高明,终不及基于善本的“本校”来得可靠。

前一阵看日剧《晚餐》,关于一家意大利餐厅的故事,江口洋介演一位毒舌大厨。他的美食公式是:素材×烹调方法=味道。即极力强调食材的重要性,没有好的食材,就没有美食可言。

校勘学的关键在于好版本,美食的关键在于好食材,人的能力再强,也仍是第二位的——其事虽异,其理却同。

274

吴稚晖、鲁迅都主张不要读线装书,吴甚至说应该将线装书扔进茅坑里,但早就有人指出,他们自己都是饱读古书的。此亦如叔本华,一贯看不起学者,看不起读死书的人,但他自己却是好读书的,买书藏书也不少。

从叔本华到吴稚晖、鲁迅,他们都是刻意表达一种“偏见”,一种“修辞策略”,是在特殊语境中有针对性地作出极端表述——正如胡适说的“全盘西化”,其实也是“修辞策略”,实

际上他既不认为中国应该全盘西化,也不认为中国能够全盘西化。

275

“言有易,说无难”,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名言了,亦可视为一条通则。意思是:要证明某一事实存在是容易的(一条史料就能证实),但要证明某一事实不存在却很难(一条史料就能否证)。

这一条治学通则,其实也借用到娱乐八卦方面:对于明星或大V来说,旁人要传他们的八卦绯闻乃至丑闻是很容易的,但他们自己要澄清就很难了,即便无中生有的事,当事人也不易撇清。这是传播领域的“言有易,说无难”。

烧日记(二)

□钱之俊

可叹息的是,钱基博的日记毁于他人之手,而钱锺书与杨绛的日记,则是自己毁的。

钱锺书一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,数量非常可观,而且大部分生前都保存下来了。一般人可能想不到,他少年时期在江南的日记,以及到清华大学求学时期的青年日记,在其晚年,都失而复得。1981年,有人在无锡“二清办”发现17册钱锺书早年日记。钱锺书得知后,很快要回去了。(见《钱锺书的少年日记写了什么》,《江海晚报》2018年2月14日)

留学英法时,钱锺书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下与杨绛的读书、生活细节。《钱锺书手稿集·中文笔记》出版后,其中有幸保存下的几页牛津日记,显得尤为珍贵,更多的细节被披露了出来。1938年他回国到西南联大后,夫人杨绛与女儿皆不在身边,他孤身一人在昆明生活,“给阿季写信很勤,还特地为阿季写下详细的日记”。(吴学昭《听杨绛谈往事》)

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后,1939年12月初来到国立师范学院(湖南蓝田),任英文系主任。在《钱锺书手稿集·中文笔记》中,钱锺书的蓝田日记居然被保留了下来。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钱锺书手书最长、最连贯的日记了。1941年暑期,钱锺书从蓝田回到上海,直至1949年8月北上,在海上8年。但他的日记笔者所见有限。目前,上海日记披露较多的是1949年春游杭州日记,实际上也算不上上海日记,因为多作于杭州了。1949年后,钱锺书仍保持写日记的习惯,但以读书日札或笔记为主,很多私密的日记就和日札或笔记混在一起写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,钱锺书外出访问期间,他不往家寄信,而是写长达一个小本又一个小本的日记,全是对杨绛说的话,所见所闻和“思念之情”,极其详尽。这些日记回去后要亲自面交杨绛。如果杨绛出访,钱锺书在家,他每天也会写下家中琐碎,称为“备忘而代笔录”日记,女儿不时也插上几句评语附识,留待杨回来看。

钱锺书的这些日记,在他生前他自己已毁掉一部分。昆明日记直到1949年他们从上海迁居北京时仍然保存,只是此次搬迁,他们在仓促中把日记等忘记带了。直到1977年后,堂侄钱汝虎忽然从上海将昆明日记挂号寄到北京,却已腐蚀,“一页页结成了块,无一字能辨认,锺书和杨绛就把它毁了。”(《听杨绛谈往事》)1952年,思想改造运动期间,传闻学生要检查老先生们的日记,钱锺书就把自己日札或笔记中的私密日记部分剪掉毁了。其他日记和笔记一直保存到1998年去世。

钱锺书离世后,杨绛费数年之功,整理出版了丈夫庞大的手稿笔记,即《钱锺书手稿集》,也是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。但她还是狠心地隐没了其中的“私人私事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钱锺书销毁日札中私人生活日记是出于不得已,如今事过境迁,就不该再搞“洁本”了。但令人震惊的是,据晚年杨绛亲近之人透露,杨先生在去世之前,竟将自己写了很多年的日记全部烧毁!这其中,可能包括钱锺书未和笔记一起出版的其他日记。呜呼哀哉!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二四



新书快递

致命流感:百年治疗史

[美]杰瑞米·布朗著 王晨瑜译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流感为什么难以治愈?病毒如何变异、传播和致病?是流感本身更致命,还是流感导致的社会恐慌更致命?流感为什么有季节性?哪些因素影响流感的爆发?在对抗流感的过程中,药物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,还是仅仅给了人们一种安全感?我们距离找到一种有效的流感疫苗还有多远?从文明出现曙光至今,流感一直伴随着我们,作为世界十大致命疾病之一,困扰着地球上所有的文明和社会。作者探究了人类发现流感病毒并与之抗争的历史,审视了与流感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,旨在提供全面综合的历史的同时,探索一条治愈流感的未来路线图。

第三帝国的到来

[英]理查德·J. 埃文斯著 赖丽薇译
九州出版社

纳粹统治德国的时间虽只有十二年,却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,在现代世界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探究纳粹党徒的心理,理解纳粹的反对者为何未能阻止他们,明白纳粹独裁政权的本质和运作方式,并

从中吸取教训,避免历史重演,时至今日依然必要。

家族试验

张怡微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这本书是张怡微至今未曾完整结集的青春暗室,来自本能与天赋的城市情感经验书写。从《细民盛宴》回溯至《家族试验》,回到写作者观看世界和生活的起点,若干原本不相干的人在此温情相遇……

聊斋新义

汪曾祺著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这是汪曾祺对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的改写,共13篇。汪曾祺在改写时,保留了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特点,削弱原著中传奇性的情节,以他独有的清新质朴的语言魅力及其一贯的小说创作风格,开“新笔记体小说”之先河,并将古本《聊斋》的故事和人物注入现代意识,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视界,从一个新的高度对原著中男女之间、人狐之间,甚至人与动物、死物之间的故事进行了颠覆、重构与提升,使其不再只是奇闻异事的记录,堪称难以超越的对蒲松龄原著的“故事新编”。